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考

林学军 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暨南大学教授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集体奋斗的理论结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在改革开放近 40 年之际,我们有必要总结和丰富这个的理论宝库,以指导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持续发展。

在研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时,我们有必要弄清以下几个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起源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起源于西方的古典经济学。任何一种经济理论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一定的社会经济活动实践的产物,同时它又是吸收前人的理论成果基础上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也不例外。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理论渊源关系来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主要来源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英国的古典经济学由威廉·佩第(1623–1687)始创,亚当·斯密(1723–1790)集其大成,大卫·李嘉图(1772–1823)最后完成的。马克思正是吸收了他们的精髓,以及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写下了《资本论》不朽的篇章。当时,英、法、德等国产业革命,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终确立并彻底取代了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使生产关系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经济迅速发展,社会财富不断增加。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压榨,社会财富分配不均,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频繁暴发,许多经济学家对此进行研究,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学派,一派是为资本主义辩护的庸俗经济学,这一派主要论述了私有制、自由竞争是最完美的经济制度,力图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并逐渐取代古典政治经济学而居统治地位。另一派,在 19 世纪中叶,诞生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它代表了广大无产阶级的利益,认为当时的社会矛盾的主要根源在于私有制,因此,要解决社会矛盾,就必须建立新的社会制度,以公有制代替私有制,以计划经济代替自由竞争,消灭剥削,消灭阶级,达到共同富裕。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区别

1、它们所站的立场、所用的研究方法、所研究的对象不同。

(1)它们所站的立场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站在无产阶级一边,宣称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而西方经济学站在资产阶级一边,竭力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

(2)它们分析问题的方法不同。马克思主义是用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而西方经济学是用主观的、片面的方法来分析问题。例如西方经济学的效用问题,如何判断面包与家具效用的大小,它们用数字进行描述和分析,十分主观,只涉及表面现象,没有触及社会的本质。

(3)它们研究的对象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西方经济学主要研究人与物、物与物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重视人与人在生产中结成的关系,通过所有制和分配关系的改变,改善人与人的关系,提高人的生产积极性、创造性,推动人类社会财富的增长,推动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而西方经济学主要研究资源配置等问题。

2、由于它们的立场、观点不同,它们所得出的结论也是差异的。

(1)西方经济学鼓吹私有制,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宣传公有制。西方经济学认为自私自利是不变的人性,其论述均以人是经济人为前提,因此,讨论的主要内容是如何定价,定产量,如何配置资源以达到利润最大化,充分地表现了资产阶级贪婪的本性。在他们看来私有制、自由竞争是最理想社会形态,私有制可以最大限度发挥个人潜能,满足个人的私欲,也才是最有效率的,是市场经济的唯一基础,而自由竞争,资源得到最优配置,社会福利达到最大。尽管西方经济学学派众多,但都以私有制为前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人是社会人,历史人,人类社会的目的是要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建立一个公正平等,物质极大丰富,精神高尚,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

(2)西方经济学主张以市场调节经济,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张以计划调节经济。西方经济学由于是以私有制为基础,所以崇尚市场自由化,主张用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经济。早在十八世纪,古典经济学代表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就提出让价格机制和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经济。指出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只要大家都追逐利润最大化,整个社会的财富也就达到最大化。虽然后来出现凯恩斯主义,主张国家干预经济,但由于出现经济滞胀,20 世纪 70 年代后出现的新古典经济学,1970 年代卢卡斯为代表的新宏观经济学倾向凯恩斯思维,反对对国家干预经济,其均价值理论、弹性理论、个量分析法,亦是自由放任思想。20 世纪 30 年代后,新自由主义产生,包括现代货币主义、供给学派、新制度经济学等流派,它们也都反对的国家干预经济政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公有制为基础,认为国家计划可以消除经济危机,保证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保证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把国家划分为多个经济部门上,按国家计划进行资源配置,组织生产、分配、流通、消费。这样可以克服市场调节的滞后性、盲目性,从而做到预见性,有计划性减少损失,并保证社会的公平和公正。

(3)西方经济学认为商品的价值来源于商品的效用,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劳动创造价值。西方经济学认为商品的价值决定于边际效用。该理论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一些奥地利经济学家提出来的,主要代表有门格尔、庞巴维克、维塞尔等。可以说,西方经济学理论大厦正是建立在效用价值论基础之上。为了说明商品的效用,西方经济学家费尽了心思,提出了基数效用论和序数效用论,并用十分完美的数学公式进行证明,说明商品有用就有价值。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科学完整的劳动价值论,认为商品的价值是因为商品中凝结着人类的劳动,具体劳动形成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形成商品的价值,价值的本质是生产关系,它体现人与人之间被物的外壳所掩盖的社会生产关系。商品的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

(4)西方经济学倡导按要素分配,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倡导按劳分配。西方主流经济学是以要素价值论为基础的,这一理论认为价值是由包括劳动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共同

创造的,各种要素(包括资本、土地、劳动、资本家才干)都为创造价值做出贡献。因此,收入来自各种要素在价值创造中所做的贡献,资本得到利息,土地得到地租,劳动得到工资,资本家才干得到利润,各得其所,谁也没有剥削谁。市场机制的分配最公平,最有效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这一理论认为价值的惟一源泉是活劳动。因此,主张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不劳者不得食。而西方经济学的分配方式必然产生剥削,产生两极分化,这是新旧制度的根本区别。

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吸收西方经济学精华的产物

我国经济理论是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吸收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促进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三次飞跃。第一次飞跃是,1956 年和 1957 年,毛泽东先后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标志着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发展:在发展道路选择上,提出了“有批判地”学习借鉴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思路;在社会矛盾的认识上,提出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在经济运行上,根据中国的实际提出了价值规律作为“伟大的学校”在中国存在的合理性;在发展战略上,提出了“两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第一步从第 3 个五年计划开始,用 15 年时间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是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在经济结构上,从中国是个农业大国的实际出发,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同时,还提出了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战略构想。第二次飞跃是,1984 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确认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92 年,党的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标志着社会主义本质与市场经济体制结合的初步形成。第三次飞跃是,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这个报告更加重视市场机制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提出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七大提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党的十八大进一步强调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凝聚力量,攻坚克难,坚定不

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新一届党的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的作用,减少行政干预,确保经济按照市场规律发展。

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同时,我国的经济理论也在不断地学习吸收西方经济学的精髓。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学界认真学习、研究西方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并运用到我国经济建设的实践中。西方经济学的思想确实推进了我国的经济建设,推动了改革开放的发展。我们对于西方经济学的正确态度,早在改革开放初期的 1983 年,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教授就提出了几个很重要的观点:第一,因为社会经济制度根本不同,所以西方经济学作为一个整体不能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与改革的理论;第二,在若干具体问题的分析方面,西方经济学的确有可以为我们参考借鉴的地方;第三,由于制度上的根本差异,甚至在一些技术性的具体问题上,我们也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某些经济政策和措施;第四,对外国经济学说的内容的取舍,根本的原则是以为我为主,要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他说,我们既要承认外国经济学在其推理分析、计算技术、管理手段等方面有若干值得参考借鉴之处,但是我们又不要盲目推崇,生搬硬套。陈岱孙教授的理论主张今天仍是适用的。

我们要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不能走极端。要反对一切“右倾”和“左倾”的倾向。“左倾”的思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给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造成严重的损失,搞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相反,那种认为搞市场经济不能依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只能依靠西方经济学的观点也是错误的。前苏联亡党亡国,俄罗斯休克疗法给国民经济造成大倒退,这些都是血的教训。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与中国经济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才是正确的道路。

四、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我们可以用实践证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正确的。中国改革开放近 40 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全球第一,外汇储备全球第一,物价稳定,社会安定,目前被国内外所高度关注,称之为“中国模式”、“中国经验”或“中国道路”。这一模式的主要思路是:

(1) 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是对立的,中国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2)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又要符合中国的基本制度和具体国情的要求。

(3) 在坚持公有制主体性和国有经济主导性的同时,积极发展非公有制和非国有制经济。

(4) 把市场机制作用与政府的宏观调控有机结合起来。

(5) 市场经济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的内容和形式要随着制度环境、技术基础和文化传统的发展而变化。

(6) 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是一个包括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深刻变化的长期而复杂的整体性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7) 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同时,坚持有序开放,独立自主,改革创新,学会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8) 把改革、发展与稳定统一起来,市场经济的发展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服从以以人为本的目标。

(9)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不实行西方式的政治体制。

(10)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显然,中国模式的这种丰富性、独创性和深刻的历史意义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和说明的。

我们要努力创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理论,用它来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理论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问题为研究对象,它所研究的内容既包括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问题,同时也包括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问题,它是一门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学问。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理论内涵十分丰富,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它所回答的是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什么;

(2)社会主义生产力理论——阐述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的基本国情、主要矛盾,研究如何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解放与发展生产力;

(3)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理论——阐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所有制结构、公有制实现形式等;

(4)社会主义分配理论——研究初级阶段基本分配制度、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形式、国民收入的分配问题,研究如何达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

(5)市场体系理论——研究完善市场体系、健全市场机制、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作用问题;

(6)企业制度理论——研究和阐述企业资本结构、经营组织形式、法人治理结构及管理方式等;

(7)宏观调控理论——研究如何处理市场与计划的关系,以及政府宏观调控的职能、调控手段及调控方式等;

(8)经济发展战略理论——研究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及战略步骤、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产业技术进步等;

(9)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在中国特殊国情下如何实现经济适度增长,同时实现环境的有效保护、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等;

(10)对外开放理论——研究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阐述利用国外资源和海外市场,发展对外经济合作,扩大国际贸易与投资等。

综上所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与经济学理论相结合的产物。首先,它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自己的理论基石,吸收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和政策主张而创立;其次,它既总结了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经验教训,同时又吸收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发展的有益的养分,是人类经济发展成功经验的总结;最后,它把经济建设与政治、文化、社会、资源、环境等问题相结合,形成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

对结构主义经济理论的新认识

袁兴昌

场机制的扰乱作用,揭示了市场在收入分配方面的向心性和排斥性两大特点,肯定了市场在联系生产者和消费者方面的作用,以及在消除了经济和社会的重大失衡之后作为生产资源配置的有效机制这两大功能。强调了国家在消除经济社会重大失衡方面作为市场最高调节者的作用。

新结构主义理论是在 80 年代中期出现的,最初作为研究通货膨胀加速现象的一种理论,90 年代起研究发展问题的结构主义学派整体转变为新结构主义。新结构主义的意义在于它继承了结构主义理论的基本分析方法,在肯定结构主义理论关于通货膨胀基本压力和传播机制的基础上,进行了理论创新,解释了结构主义理论和货币主义理论都无法解释的通货膨胀加速现象,深化了结构主义理论关于市场背后各种权力因素的研究,揭示了这些扰乱因素对通货膨胀长期持续和加速所起的作用。

结构主义的另一点特点是它的批判精神,在批判中创新是这一理论与时俱进的主要动力。在不断批判西方正统经济理论用简单化、公式化的分析模式和以理论的精确性和严谨性确立其普遍真理地位的企图之后,指出了这种理论因排除社会现实、政治现实、文化现实和历史发展因素而存在的科学谬误,揭示了真正的市场规律是,在结构失衡的条件下经济的自发作用不是自发地导致体系的平

衡、效益和公正,而是将收入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将大多数人排斥到市场之外,一极是繁荣以致富足,另一极则是持续的贫困。认为市场既是一个吸收性的体系,又是一个排斥性的体系,这是由资本主义发展的向心性、垄断性和排斥性所决定的,不论在国际范围内还是在国内发展过程中都是如此。

结构主义理论批判了西方正统经济理论的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是把经济的最高调节作用归于市场。认为经济理论通常有两种不同的动机,一是坚持科学地解释现实中出现的各种现象,一是寻找并拥护某些符合特定利益的原则。在现实生活中,经济理论中科学的一面往往被抛弃,而符合某种特定利益的原则常常被用来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结构主义理论在分析了高消费现象与通货膨胀的关系之后,还深刻揭示了国内高收入阶层在消费方式、思想感情和经济利益关系方面与中心国家关系日益密切与本国大多数社会阶层越来越格格不入的趋势,指出了外国与中心在经济、技术、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依附现象。认为外国国家只有创造自身的动力和打破过去的格局,才能真正获得发展。为此,我们需要自己努力来进行理论创造。

1949 年普雷维什进入拉美经委会工作后,于 1950 年发表了《拉丁美洲的发展和它的主要问题》的文章,被视作结构主义理论的奠基文章,文章中提出的中心—外围概念奠

定了这一理论的思想基础和分析框架或分析模式。

在文章中,普雷维什挑战了新古典主义关于“技术进步带来的好处往往是在整个国际社会均匀分布”的论点,批判了新古典主义关于这种均匀分布“是通过降低价格或是通过收入的相应提高”来实现的说法。

普雷维什认为,关于比较优势原则的作用和国际投资进程的静态描述未能恰如其分地在时间上反映工业发达的国家(即“中心”)和提供食品和原料的国家(即“外围”)之间正在发生的情况。

根据实证研究,普雷维什的结论是,工业化国家在日益增长的寡头垄断条件下生产的制成品的相对价格,日益倾向于超过外围国家提供的初级产品的价格。因此,发展中国家没有获得中心国家承诺的因生产率提高而产生的利益。从长远来看,不利的贸易条件不仅剥夺了不发达国家在收入分配方面应该得到的稳定的份额,而且还剥夺了它们推动内部变革和经济增长的资金和技术手段。

在《外国资本主义》中,普雷维什从四个方面分析了社会结构是如何制约经济发展和引起通货膨胀的:

收入分配不公。一部分人占有发展成果的大部分是造成收入分配不公的主要原因,“那种对发展成果如此不公平的分配,主要是由于社会结构的上层以经济剩余的形式

占有了技术进步成果的一大部分”;

高收入阶层的高消费倾向。“剩余的一个重要部分被上层用于模仿中心国家的消费。在特权消费社会中存在着对资本积累潜力的一种巨大浪费”;

社会边缘化趋势。“面对劳动力的迅速增长,资本积累就变得不足。体系就这样把大量群众排斥在外,使他们在社会结构的底部无所事事”;

高收入阶层的离心倾向。高收入阶层在利益关系上和思想文化方面日益与发达国家更加密切,而与本国的社会阶层越来越格格不入,形成对发达国家的经济依附、技术依附、文化依附和意识形态依附的现象。一旦统治集团之间相互勾结,甚至形成政治利益和战略利益方面的依附现象,这些发达国家由于其动力的向心性,除了施加种种限制外,还阻碍着外围向外发展。普雷维什指出,“这些都是非常严重的矛盾。其后果又由于与发达国家的关系明显不协调而加剧”。

这就从社会结构变化的角度解释了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的高收入阶层总是如此向往发达国家的消费方式和将资金转向国外,而不适用于国内的积累和发展。普雷维什认为,“外围资本主义主要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上的,这种不平等的根源在于,主要是那些攫取了大部分生产资料的人们将经济剩余集中为己有。剩余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结构现象”。